

姜汝真 主编

中国传统文化 的历史阐释 与现代社会价值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 的历史阐释 与现代价值

山西教育出版社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刘立平
特邀编辑 张晓芒
复 审 王秦伟
终 审 王宇鸿
封面设计 王春声
版式设计 荷 屏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

主编 姜汝真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69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313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

ISBN 7—5440—1249—2

G·1250 定价:13.40元

前 言

中华文明是具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经历的屈辱，曾使不少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某种疑问。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人们的自信心得以恢复，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振兴和祖国的统一。

基于这一认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邀请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到我院授课，他们是：西北大学前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张岂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教授，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杨纪珂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金开诚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楚庄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教授等。他们的讲课深入浅出，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深受各层次学员的欢迎。为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海外统战工作的需要，由李道湘副教授、吴乃华副教授具体策划，我们在专家讲课内容的基础上，按专题约请有关学

者，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本书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姜汝真副院长任主编，张先义副教务长、李道湘、吴乃华任副主编；李道湘、吴乃华负责确定本书的选题与结构，以及全书的整理工作。

全书五章，即五个专题，分工撰稿如次：第一专题由张岂之、冯之浚、楚庄、金开诚、张先义撰写，第二专题由方克立、沙健孙、胡滨、韩昱、吴乃华撰写，第三专题由朱越利、李道湘、魏彬、金申、曹萌撰写，第四专题由杨纪珂、安平秋、贾春增、高敬增、王兴来和李英成撰写，第五专题由姜汝真、张大可、王志功、孙瑞华、罗传芳撰写；本书还由黄冬有等同志整理出中华文化论文、论著（1990年~1996年）目录索引作为附录。本书在组织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他们热心撰稿，积极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姜汝真

1997年4月

目
录**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思潮 / 1**

- 一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 2
-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 7
- 三 中华文化的唯物主义传统 / 39
- 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应”说 / 45
- 五 儒学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意义 / 56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 65

- 一 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 / 66
- 二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 78
- 三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93
- 四 中国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理想人格 / 107
- 五 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 122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 / 141

- 一 《金瓶梅》与鬼神文化 / 142
- 二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儒道佛三教合流 / 161
- 三 孔孟的时间观与忠恕观 / 172
- 四 佛教文物的研究与收藏 / 183
- 五 儒家劝学及其精神文明价值 / 188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 205

- 一 汉字与中国文化 / 206
- 二 茶酒文化与中国文人 / 214
- 三 汉字文化与计算机时代 / 225
- 四 佛教与中国书法 / 232
- 五 中国传统绘画的文化审美价值 / 254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 / 265

- 一 中华文化与统一战线 / 266
- 二 《史记》的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 275
- 三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 301
- 四 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 / 317
- 五 东汉社会批判思潮与理性自觉 / 329

**附录 中华文化论文论著目录索引
(1990—1996) / 345**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思潮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各种文化思潮的一把钥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近几十年现代儒学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是当代人面临的重大课题。全国而深刻地理解当代文化思潮，往往需要从其历史和思想的渊源着手，这正是本章所要阐述的。

本章撰稿人（按照内容先后次序）：

张岂之，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冯之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楚 庄，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金开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教授。

张先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务长。

一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一）“人文化成”——文明创造精神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尽管学术界在年代上暂时还没有一致结论，但是有一点共识，即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农耕分不开。约定俗成，一般都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余年前的炎黄时代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这和炎帝、黄帝部落关于农耕的实践相联系。不过，这只是举例，并非严密的科学论证。因为远古先民们从事原始农业并不始于炎黄时代，要往前推。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河姆渡文化典型堆积的第四层，具有良好物质条件，“极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和渔猎活动”。^①

有的考古资料说明，从距今六千余年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存来看，先民们已发明了一些简单的谷物加工工具，把谷物（粟、小米）放置在石制的碾磨盘上，然后手拿石棒或石饼反复碾磨，即可脱去谷物外壳，将其磨碎。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先民们在实践中，当其某些预期目的得到实现的时候，即标志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有了这个起点，再加上必备的物质条件，才会有中华文化及其人文精神的萌生。

从农耕活动中受到启示的古代先哲，总是把观察天象和研讨

^①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

人事二者联系起来。《周易·贲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天文”和“人文”这二者的结合作了很好的说明。从社会人事即人文方面看，创立各种制度，使社会趋向文明、稳定，摆脱粗鄙和野蛮，这就是“化成天下”的本来含义。

为此，先秦的儒家代表们总是以西周时期礼、乐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作为论证的材料。所谓礼、乐，既是西周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制度的总称。礼即是礼仪制度，主要用来区别嫡庶、尊卑、贵贱，使社会各种人能安于其位。乐即音乐。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包含《乐经》。他认为《韶》、《武》等雅乐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高尚情操，使人懂得遵守礼制。可是《乐经》自秦以后即亡佚，内容不得详知。对于西周礼、乐人文文化，孔子是赞美的。

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所谓人文精神并不单指西周时的礼乐文化，而是泛指在社会制度方面，同时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伟大创造；也指人们应当具有的与粗鄙、野蛮相对的美德。这种创造精神与文绣美德成为“人文化成”的全部内容。很明显，这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二）“刚柔相济”——理论思维力量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不是建立在対人格神崇拜的基础上，相反，它是从人格神的迷信中逐渐解脱出来的产物。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表现于：哲人们从对自然的解剖入手，经过分析综合，舍弃其具体的相异点，而向高度抽象化方面发展。科学的抽象距离具体的事物越远，便越能够揭示具体事物的某些本质。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科学抽象力越

强，则说明其理论思维水平越高。先秦时期《老子》和《易传》所达到的哲学高度表明，中华民族一开始就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做为人文精神的基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抽象力并不是依靠对于古代典籍中某些命题的演绎，从《老子》书中可以看出，它认真地研究自然，从自然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法则意义的命题。其中关于世界本原的范畴——“道”的规定，以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这一普遍法则的提出，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道”的主要属性之一的“自然”之义，是怎样被老子认识并抽象化的呢？这是源于哲人对自然现象，其中包括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为而不恃、循环往复的农耕活动中得到的素材，并加以研究和提炼的结果。在《老子》书中循着从自然到人事的思维路径，加以推论，其例不胜枚举。当代学者朱谦之先生的《老子校释》中就有很好的说明。至于老子关于“道”的另一属性“柔弱”，也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得出的概念，再将它运用于社会人事，认为柔胜刚，只有柔弱才能战胜刚强，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老子作为中国自然哲学的开创者，当之无愧。自然现象经过老子的抽象，凝结成为关于世界本原、运行法则、人事社会法则诸方面的辩证理论观点，构成比较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除此，还有另一方面，即从整个人类理论思维发展史来看，在它发展的早期，哲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探索，有时会淹没人的主体性。这就是说，哲人热心地从事于客观世界的研究，有时发现了法则的某些方面，有时只是洞察和猜测，他们往往忽视了发现者在研究实践中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以及印度哲

学中都有先例。老子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忽视，与其说是他的理论思维的偏颇，毋宁说是人类理论思维必经的曲折。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理论体系，在《易传》中就没有这样的偏颇。《易传》是解说《易经》的著作，产生于战国末年，作者有待研究。其中《系辞》可以说是对先秦时期的理论思维做了认真的总结。《易传》对于事物的抽象基于两个基本范畴，即阴与阳。原初人们在农耕活动中将山的向阳面称为阳，向阴面称为阴。在演变过程中，其含义随之扩大，抽象化为两种自然物质力量，即阴气和阳气。对此，《易传》又进行了抽象，使它们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认为任何事物都含有刚健属性、即阳，柔弱属性、即阴。它们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便演出世界上纷纭复杂的画面。《易传》主张人们面对这样的世界，以刚强为主，柔弱为辅；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运筹帷幄，必操胜券。

《易传》真正体现了“抽象”的作用，是它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将可以感知的属于事物具体现象范围的命名为“形而下”，将无形的从事物中抽象得出的法则称为“形而上”。《易传》对此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证，但这一命题可能是先秦时期“人文化成”中关于法则与现象的最深刻的抽象。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论思维的发展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辩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之处。

（三）“厚德载物”——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家庭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它本身的和谐和稳定，乃是整个农业封建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调节，不靠宗教，主要依靠道德规范。于是，从先秦时期起，包括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道德思想体系便应运而生。这是当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周时起，人们即重视关于人自身的探讨。《尚书·泰誓上》说：“惟人万物之灵。”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道德等方面的系统学说，有的学者称此为“人”学。其理论基石乃是人兽之辨、文野之分以及文质统一思想。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讲道德教化，而道德的特征在于文质的统一。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颜渊》），主张礼仪形式与人的思想感情的统一。在他看来，人自身有许多特点，为增加人的价值含量，使之成为君子，人们必须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提高自己。

从总体上看，先秦时期儒家所讲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平实、广博，易于实行。至于秦汉以后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某些方面的变质、僵化，这里不论。先秦时期的儒学主张：人应当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为此就必须学习。世界上不存在这种状况：有人天生是圣人；有人虽然刻苦学习，但注定不能成为君子或圣贤。中国道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排斥了这两种倾向，使得道德修养真正成为使人完善的手段，而堵塞了神性长久驻足其间的可能，意义极为重大。

古代哲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只有不畏艰险，具有刚毅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尤其重要的是，道德

修养不单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家庭群体和天下国家。这就是说，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高尚理想，做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大丈夫”的品格，孟子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怀！把人的价值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逼真写照。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中国人的气节。

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始终没有宗教化，而宗教也没有伦理化。这二者基本上是分离的。因此人的精神陶冶，取善舍恶，不靠宗教教义，而靠伦理道德教化，这就更加突出了人文精神的作用。至于先秦以后的封建礼教，也不是宗教，而是带有政权强制性的关于社会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已超出了道德伦理的范围。

中华人文精神并不限于先秦时期，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其最基本的方面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我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真正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人文精神，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曾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荣昌盛，闪烁过历史的光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受人欺

凌，任人宰割，中国传统文化则作为酿成国弱民穷的根由之一也随之承担了部分的历史责难，几度遭遇批判与否定。然而，当欧美式的现代化模式度过了鼎盛时期之后，逐渐“世衰道微”，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时，中国传统文化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视整体思维、强调天人谐调的生态观念以及重视“人伦”、讲究“执中”、“致和”的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等文化遗产是十分宝贵的，只要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中挖掘合理内核，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将为后现代化社会提供有价值的馈赠。

（一）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回顾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思维方式上经历了“朴素整体论”——“传统分析论”——“科学系统论”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一般而言，西方的思维方式重分析，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整合。当人类进入系统时代以后，人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方式中得到了有益的启迪。

中世纪以前的古代科学，可称为“朴素整体论”的时代。不论在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古埃及，都有着“朴素整体论”的烙印。古代先哲们追求整体性、统一性，并以各种元素作为解释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他们之所以如此看待世界，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水平比较低下，人们只能在直观观察的范围内，将客观事物的整体形态作为考察的基本层次，从事物的联系上来把握对象，而这些总联系的细节还不可能得到说明。采用这种方法，对事物细节的认识虽不够精确和严密，然而对事物总体的认识却有着较为正确的猜测。

“传统分析论”始盛于近代自然科学。15、16 世纪，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拉开了近代科学的序幕，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纷纷从哲学中脱解而出，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分析法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各种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把事物从联系中抽取出来，对它们的特性、原因和结果等方面逐个加以分析研究。传统分析法反对含糊笼统的臆断，要求把一切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仔细地一一详加考察，直到一目了然。法国科学家笛卡尔在他的名著《方法论》中，曾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传统分析方法的特征。笛卡尔在其《方法论》第二条规则中指出：“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在其《方法论》第四条规则中指出：“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① 笛卡尔的方法论影响了整个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分析方式无疑是最先进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实质上是分析方法的胜利。

然而，任何进步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有时甚至要人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取代了朴素整体论的传统分析论，一方面使科学事业获得了永远值得人类自豪的光辉成就；另一方面却使人们的哲学思考逐渐淡忘了世界的整体联系，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人的分裂”。^② 人们把各种复杂的系统视为可以随意分解的简单对象，如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就把人和动物看成是由多

①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D·波姆：《片断与整体》，《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 年第 4 期。

种零件组装的“机器”，认为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些简单的基础上，建造起了整个逻辑的大厦”。^①化整为零、分门别类固然是科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但同时也不应忽略使人类的各种知识相互联结起来，使之具有一个系统的那种固有联系。这是人类完善自己的哲学思考，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并予以科学的阐释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分解的巨大成功带给人们的喜悦和荣耀使他们一时忘却了整合的任务。“孤立的专门学科失去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连线，学者们也同样隔绝起来了，他们不再从事需要许多人协力进行的共同工作……不再意识到他们都负有共同的使命，每一种专科都越分越细碎，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体系。”^②

著名物理学家波姆在《整体与稳秩序》一书中指出：“分割的过程是一种对事物进行思维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在实际的、技术的和功能的活动中是方便的和有用的。然而，当这种思想模式更广泛地应用到人类对自身的观念和他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的观念（即应用到他的自身世界观）时，人就不再把这种分割结果看作纯粹是有用的或方便的，而是开始把他自己和他的世界看作并经验到实际上是由独立地存在的片断构成的。当以这种片断的世界观作指导时，人则要用某种方式将自我与世界破碎，以致一切似乎是符合他的思维方式的。这样人就获得了他的片断的自我世界观的正确性的表现证据，尽管他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是他自己按照他的思想模式行动的，他自己被分成片断，而这种片断现在似乎成了一种自主的存在，而与他的意志和愿望无关。”^③

①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② 《圣西门演说释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页。

③ 波姆：《整体与稳秩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4期。